

客家研究輯刊
客家研究輯刊
客家研究輯刊
客家研究輯刊

主編 黃綠清

編

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

客家研究輯刊

葉選平題

1995年第1期(總第6期)

客家研究辑刊

1995 年第 1 期(总第 6 期)

主办单位: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
编 辑:《客家研究辑刊》编辑部
主 编:黄绿清
副 主 编:陈 修
责任编辑:房学嘉

地址:广东梅州市梅子岗
邮政编码:514015
出版日期:1995 年 6 月
刊 号:GD-
工 本 费:6 元

《客家研究丛书》总序

陈胜彝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各个民族、各个民系的人民,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并在实践中形成既有自身特色、又与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历史与文化。客家,作为汉族族中一支形成较晚而发展颇快的民系,也不例外。

然而,客家民系在其形成发展进程中,就其迁徙的地域范围之大、与其他民系和海内外各民族交融之多,以及与此相联的牵涉面之广而言,又为其他民系所罕见。因此,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晚清以来,就逐渐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并受到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大师们的重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青年时代的罗香林先生“欲终其生以研究”华南各民族、各民系,并以“客家调查”为起点时,就得到深寅恪、陈垣、张星鉴等著名学者的鼓励和支持,“均谓有必行之必要”(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罗香林先生于1933年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被学术界誉为客家研究的奠基之作。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愈益受到国际“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因而,在中国大陆,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学术繁荣,客家研究经过较长时间沉寂后,亦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广东、广西和福建等省、区的学者们倡议组编《客家研究丛书》,反映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

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客家民系在中国南方各省区不断迁徙、与当地人民和当地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繁衍融合的发展轨迹和中华文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因此,客家研究,对于发扬各民族、各民系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团结奋斗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共同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又是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人,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不断迁徙、与当地人民和当地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还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人类文明与进步、是凭借此不同文化的交流才能不断发展的总趋势;因此,客家研究,对于发扬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友好往来、共創文明的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人类文明进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与文化,在学术上涉及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多种学科领域,领域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跨地区、跨国度的社会史与文化史、跨台性研究,同时也是一个对整体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研究和小案研究。因此,客家研究,对于促进人们运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发挥综合性研究的优势,加强不同学科的联系,沟通中外学者的交流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接触,不但有利人类学、

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语言文学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中诸如建筑学、地环学等等学科的拓宽与深化,而且,亦有利于“客家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建设。然则,诚如学者们所分析,在中国大陆,客家研究才刚刚复兴,要建立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完整的、名符其实的“客家学”,并在相关领域上都能得真正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成果,尚待艰苦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唯其如此,组织这套《客家研究丛书》,在学术上就显得更加迫切;这套丛书的出版,或许对客家研究的发展、对“客家学”的建立,能起到一点推动和打基础的作用。也正因此,我们把这套丛书称之为“客家研究”丛书,而不想称为“客家学”研究丛书,或“客家学”丛书。

我们相信,客家研究将会得到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继往开来的繁荣学术的精神,组织这套丛书,期待客家研究的新成果、新人才的不时涌现。

敬希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对组织这套丛书给予支持、帮助,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使之不致完善,有所作为是幸。

关于客家研究中运用谱志 资料失误的分析

谢重光

在方兴未艾的客家学研究和地方史史研究中,家谱、族谱和地方史志被广泛地运用,取得了不少成绩。另一方面,因为不加鉴别地引用谱、志而造成严重失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亟须引起学者的注意,对于谱、志的分值和局限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使用谱、志资料时必须审慎地区别其可靠部分与伪托不实信部分,先“善于说明问题”,再试从具体事例入手,进行分别探讨。

一、关于郭子仪后裔迁居汀州的问题

在客家学研究中被一再引用的《龙岩同乡人系谱·氏族篇》有云:

“至唐中叶,有郭子仪……有子,七十二孙。其第七子璘,出守福建汀州。年近六旬,纳妾刘氏,生子福安,世世擢第。任福建泉州太守,襄职承事郎。以官福建成,遂家于汀州郭坊村,称为郭氏南来播族之始。”

依据这一说法,如今福建各地的郭氏都自称为郭子仪后代,且以“汾阳”作为本姓本族 的堂号。其引证资料抵牾三

史，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

按新、旧《唐书》，郭子仪确实生有八个儿子，且有具体名字，曜、晔、晞、琳、晤、暧、晫、缺。其第七子郭晫“以才显”，附传于《郭子仪传》。其事虽斑斑可考，代宗朝累任司农卿，朱泚作乱，扈从唐德宗幸奉天（今陕西乾县），以护驾有功，乱平后升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封祁国公，贞元末年卒^①。

郭晫的官职如此显赫，其身行事如此明白，有关正史记载得如此清楚无疑，而有关谱牒建置竟不显，杜撰出郭晫其人，编造其出守汀州，晚年纳妾延氏，生子耀世士，守泉州，袭取承事郎云云，不但直接与正史记载严重冲突，又与当时制度矛盾。比如金吾卫大将军为正三品的武职，祁国公为从二品爵，汀州刺史则仅是从四品以下的外官^②。若说郭晫乃郭晫传写之误，那么何谓显赫的盖世功业之子，又怎能出任仅仅从四品以下的蛮荒偏远小州刺史呢？又如承事郎一职，是宋代文散官，唐时仅为正八品^③，唐时从三品衔泉州太守，少（按，应为刺史）的郭祐安，怎么能承袭只有正八品的宋代文散官呢？凡此种种，翻烂百出，贻笑大方，充分暴露出有关郭氏谱牒拉名人作祖宗的卑劣手法，这方面内容是不是为据的。

二、关于潮粤南支薛氏始祖问题

《客家姓氏溯源》“薛氏”条载：

① 《旧唐书》卷180《郭子仪传》附郭晫传。《新唐书》卷177《王士元传》附郭晫传。

② 《新唐书》卷4《地理四》。

③ 《唐中》卷3《职官四》。

④ 《唐书》卷177，王祐刺史衔从三品。见《新唐书》卷174《地理五》附王祐传。

“七世孙，歙县有薛彦博者，生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丁亥进士。初宰江陵，后迁郴丞，无意仕宦，任满尝参禅宗马祖大师。因卜居宜章南关，建寺宅西金紫岭，更名向彦，年九十八，歿于宋太宗淳化三年，是为湘粤南支薛氏始祖。”

按薛彦博或薛向彦之名，不见于徐松《登科记考》，其人是唐于后唐时登进士第，事属可疑。更为荒唐的是，马祖道一禅师为唐中叶时人，卒于唐僖宗贞元四年戊辰岁（788），唐宪宗时追谥为大寂禅师，名士大夫包拯为之作碑，叔德舆为作塔铭，而薛彦博为唐宋至宋初时人，其言官任满之后已是五代时期，又焉能参拜已经作古一百多年的禅宗马祖大师？族谱所记如此谬误，怎么能取信后人？论者以之作为探讨客家源流的依据，岂非失于鉴别不精，而使自己的立论失去坚实的基础？

与此相关的是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许多论著根据所搜集到的客家族谱、家谱，论证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但谱牒之中最不可靠的恰恰是有关各家族的祖先谱牒部分内容。正如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的：“谱牒之不可信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伯之祖，名人仕之宗也。”^①既然记载客家先民是中原豪门大族，这有最实的内容多不可靠，那么对于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的论断就要大大打一个问号。

其实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郡门大族，到了唐代大多数已沦为寻常百姓，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客家的正式形成，又在北宋之后，众

① 见《顾颉刚传》（陈：《顾颉刚》）。

② 陈铁骥：《湖南人出来考》，载《文史集刊》，人民出版社，1987年。

所周知,历史发展到唐宋五代,民族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即所谓“不复以氏族为事。”^[1]那么由唐宋五代的战乱造成的大批移民,自然无所谓以土族为主体的问题,其后发生的大规模人民迁徙事件,如西凉之际和宋元之际的北人南移,就更谈不上土族不土族了。

即使把客家民系的形成追溯到隋唐之际的移民事件,即所谓“永嘉南渡”,那时移民中的土族虽然处于移民群的核心或主导地位,有人数上压倒土著土族,而多数的是依附于土族的普通百姓。不可否认的是,经过移民中由少数土族富户子孙兴旺,由多数的普通百姓繁衍,客家民系可以以姓氏客家族谱个个都说自己的祖先为客家土族,如“王”、“李”、“黄”人家前后代,那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土族土著土族土著土族土著土族意识在中国的民系中是从来没有的,客家民系中更没有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土族。

三、关于“晋安林始祖林禄”的问题

有一篇文章题为《闽林始祖——“晋安林”溯源印象》^[2]作者臆测,以为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所谓“晋安林”的源流进行了广泛而深的工作,得出了科学结论。其实不过是排比《晋安世谱》的材料,重刻了《世谱》自吹自擂以为有识之士批驳了的错误说法。如说“晋安林”的始祖林禄生于晋太康二年(281)“明帝司马绍太宁三年(323)奉敕守晋安郡,为百世晋安太守”。殊不知晋安郡始立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今漳州

[1] 王充《论衡·艺文》,《论衡》,人民出版社1975版。

[2] 福建地方史通讯,《5》,1990。

[3] 王充著《论衡》卷之四。

[illegible]

隋民父子群起从这些首领入关，在十八寨中原野上筑城，被入关之贼也制成了以盟，各筑一寨，始开为唐州。唐后移治南郑（今：汉中市南郑区）五十人姓将十的来西平，“咸亨四年（即：670年），请开朝，称顺璋推以拒隋帝，乱就距郡廿大寨。反叛之初（678年），耗循版熟，复所屯于巢穴之外，乃攻破不数寨率引随从客市中，就灾出役，乃好交民存亡，不处，黄云博地，研自决

【例 1】如图 1 所示, 已知: 在 $\triangle ABC$ 中, $AB=AC$, $\angle A=120^\circ$, $BC=6$, 求 AB 的长.

◎ 元其鎮著◎

the 1990s,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are illiterate has increased from 1.2 billion to 1.5 billion. The number of illiterate people in the world is expected to reach 1.7 billion by the year 2015. The number of illiterate people in the world is expected to reach 1.7 billion by the year 2015.

文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多下功夫，却根据1938年从永泰出土的清道光十三年（1833）重修常乐庙时所刻重修墓道馆文字的一段话大加发挥，轻易得出“始既人未知学，袁某设乡校”，“闽人始知向学”的结论，甚至说“福建的教育当始于中唐（当乾元年间兴学之时）”，“福建的文明史略（比王审知于福建兴学，在前推搡一百二十多年”对于欧阳詹，更说他被密诏礼聘“来福州多夜教书”，“他一边教学，一边读书”，“闽越之人，咸进学，由登途”，竟如此轻易立论，做出了大笑话。

我们知道，大男王审知（875—925）任福建观察使的时期，设置在建州地方兴教育，张弧之孙曾《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记其事，谓李杨“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县而明堂室，蠹策，教学兼施”，“易其址，大其制，新其讲堂，饬其黉序，俎豆既修，乃以百寮召民，考校必宿，以道必时。于是士人知敬学，士人学者功倍，士人而升仕郡邦，最不得竟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御风济济，被于地取。”^①这书描写的情况或有夸张溢美之处，但李杨在福建注重儒学教育，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事实。

张弧教文中“时李宝范携一教士说袁”一语，还勉强指出李杨在福建以前福州“有国学，只是旧制不好，学校颓条破败而已”，考之史实，南朝陈太王有国学，见《嘉禾》423—424，为昌国太学，昌国为晋义兴改名，李杨“教遂兴，兴学校”，使使“家有诗书”，“陈既克有国，修‘国子之制’”，“唐李阳公之聘，梅书堂”

^① 见《福建地方志述要》卷二，见《福建通志》卷二，有福建兴学。

^② 见《全唐文》卷536。

^③ 见《文苑英华》卷202，李杨文《福州国子学记》。

修儒也，时相程颐训子弟，每人化一，只是有衣冠文赋”，^①这说明大量精英在局部推行兴学，竟未形成普遍重学的风气，但毕竟揭开了福建教育史崭新的一页。因此，不能说福建的教育始于北宋熙宁以来或绍兴之时，更不能说福建的文明史由此开始。文明史与教育史是两回事。在北宋之前，福建已有人塾的活动。到秦汉时，已有闽中郡之设，^②不啻画版、红绳、瓯越、东越几个王国，创造了具有相当文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怎能说福建的文明史至北宋时才“始肇”？

宋代科举并不是活承袭。一个科举主的人，境界早有定论。即以理学家邵雍而言，长禄曲乡之子神宗二年（738），莆田徐彦节以兄（年79）留彦进主第，都居于凤阳徐彦第，^③徐彦进则后来受聘来福建教书。阮世到福州教书，“一田教学，一田家活”，大概是参解了陆九渊《陆子容解》如下一段话所致：

“待于时世方用，如加黜陟，诸生皆投胆。”^④

这里“诸生”指科举考生，或说科举的预备的学生，“投胆”指胆怯、佩服，于是说诸生感激敬重而肯教书。如果是据阮世循至少则应到福州教书，那肯定了阮世循的错读，更反映出宋代莆田先民对科举无所适从的心态。

六、蔡元 鵬到任与笔题

据系年资料记载，以即位用的年月，前一个月行武河天候朔日或特，所以用它的第壹旬逢壬戌为皇极皇帝，戊午月为

① 《文献堂集》卷之四《程子学记》：“程子之学，自

② 《文献堂集》卷之四《程子学记》：“程子之学，自

③ 《文献堂集》卷之四

④ 特别就笔题文章“陆子容解”而言，在《陆子容解》中，阮世循说：“陆子容解”中已有“陆子容解”字样，这是阮世循未能发现。

文和二年九月，改年号为元年，次年又改为垂拱，此后直至长安四年，即从公元688年正月到公元705年，是武则天实际执政及正式称帝称帝号武周皇帝期间。武则天建周之初即修方志，对这个时期的国事事多追溯前年移，如武则天建周之初为嗣圣二年，^①到唐元宗时已陈年号至武周元年明经及第，^②武则天随元宗于景云二年（711）迁居圣天为天后庙说成嗣圣年间建等解，^③对于这个时期，有的同志有开通弊，但以以另为一股的保存，未加详考，如《中国通史》卷第（卷五）周（卷五）武则天建周一支中，指出“嗣圣二年，武则天称帝，一泉潮而建一所以称龄”之“嗣圣二年”，“武则天称帝二年”以谓“武则天称帝二年”为“武则天二年”，^④有一人，而未能发现问题，反而把所建嗣圣中记载实为公元688年，如有一论题为《平陆建周第一庙的沿革》，并据明说“平陆建周原建于唐中宗嗣圣二年（公元713）”，“金代不建周圣元年殊元光还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竟就不暇改之而想“武则天”一后不幸被武周宗所杀，自处随被破落，一“武则天”的建周缘起，与武则天元年建周缘起相和并置。

武周，为初期，管周缘，^⑤只包有一个家谱，故谱：一再部时嗣圣年号，武则天为周世祖周思（考）周思。《周书》有云：“周世祖周思在武周时，武周元年，周世祖周思改用中宗元号”，原来，这时的周思是借用周思的办法，采取把武周大的年号改为中宗年号的办法，并了武周年之正统，中武周之製

① 《唐书》卷一百一十五，页一百一十五。

② 《唐书》卷一百一十五，页一百一十五。

③ 《唐书》卷一百一十五，页一百一十五。

④ 《唐书》卷一百一十五，页一百一十五。

⑤ 《唐书》卷一百一十五，页一百一十五。

伪。不读误书,而是有意识地“篡改”在焉。明乎此,我们就不会为翦圣年号所惑,如翦圣三年实应指拱圣年,翦圣十三年则应为万安通天元年。

误用潜、志的问题还有许多。未能备举,从上述诸例来看,利用潜、志所以致误,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旧说、旧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过去,人们比较强调潜、志的指涉思想,忽视编纂者的立场观点有问题,提醒读者注意分析批判。对于修纂的潜、志,大多认为其原记为木末、木腹、木少、木上之事。一般较为可靠。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古代的习俗,世袭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在魏晋南北朝,门第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尊卑贵贱等级。隋唐以降,门第观念仍有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很早就出现“伪楚潜曜、梁陶名门相族以及为祖宗假立官爵、姓名、尊卑”^①。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指出:“私谱之设,由于门阀。多言为家,事非虚典。”^②明天史学家薛应旂指出:“氏族之谱……大抵子孙祖述其尊先之。或始讹传,不知考论,抵牾于今。益益冒矣。”^③都统陶弘景中伪托现象和无限浮夸的普遍性。南方志对于所用门第、多谱的记载,又常根据私谱成文,如《南方志》中世述人物事迹,特别是其自述履历亦不尽可信。

潜、志记载真伪混杂的情况,要求我们使用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鉴别能力。因精力不强,不能准确地分析鉴别。

^①《潜、志》卷八《潜曜》条,《潜、志》。

^②《唐六典》卷四《礼部》,《唐六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潜、志》卷八《潜曜》条,《潜、志》。《潜、志》卷八《潜曜》条,《潜、志》。

